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思想·前沿·争鸣

The Logic of
Economic Growth
A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经济增长的逻辑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

朱富强
著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思想·前沿·争鸣

The Logic of
Economic Growth

A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经济增长的逻辑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朱富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朱富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ISBN 978-7-301-28875-7

I. ①经… II. ①朱… III. ①经济增长理论—结构经济学 IV. ①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2530号

- 书 名** 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JINGJI ZENGZHANG DE LUOJI: JIYU XIN JIEGOU JINGJIXUE
SHIJIAO
- 著作责任者** 朱富强 著
- 责任编辑** 郝小楠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875-7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em@pup.cn QQ:552063295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6.5印张 429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 印 数** 0001—3000册
- 定 价** 6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
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

——林毅夫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所创立的理论与我们所收集到的有关人类日常交往的证据之间,总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一点在经济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诺思

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更基本的因素。

——赫尔普曼

如果一个人希望很快就有收获,他就必须去种胡萝卜与生菜;如果一个人雄心勃勃地想种橡树,他就必须理性地告诉自己:我的孙子将把这片阴凉归功于我。

——瓦尔拉斯

目 录

绪论	(1)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介绍	(2)
二、新结构经济学引发争论的缘由	(7)
三、真正的学者如何参与学术争论	(12)
四、回到产业政策和政府职能之争	(16)

第 1 篇 经济增长的理论探究

1 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	(21)
一、引言	(21)
二、奢侈性消费的思想史审视	(22)
三、如何看待奢侈性消费:破窗理论的审视	(25)
四、古典经济学重视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	(32)
五、基于投资推动说的重大经济现象解析	(42)
六、经济增长政策的“现代性”审视	(54)
七、引申:特朗普主义的危险	(64)
2 “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66)
一、引言	(66)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与发展战略选择	(67)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发展模式转换	(72)
四、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的战略选择	(76)
五、引入权力与结构而非抽象的分析思维	(87)
六、尾论:重审“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战略选择	(93)

3	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与“高收入陷阱”	(98)
	一、引言	(98)
	二、“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个伪命题	(99)
	三、“高收入陷阱”具有普遍必然性	(101)
	四、资本输出与“高收入陷阱”	(108)
	五、如何理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112)
	六、尾论:理解当前世界的政策选择	(120)
4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	(129)
	一、引言	(129)
	二、“供给侧改革”的现实和理论基础	(130)
	三、防止“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偏至化	(133)
	四、防止“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简单化	(137)
	五、尾论:“供给侧改革”防偏	(144)

第2篇 新结构经济学的解析

5	认识 GIFF 框架的两大重要价值	(151)
	一、引言	(151)
	二、如何确定目标产业:林毅夫的 GIFF 框架	(153)
	三、GIFF 细化了有为政府说:经济转型的角色审视	(157)
	四、GIFF 框架嵌入的方法论意义:应用政策研究的审视	(166)
	五、尾论:理解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意义	(172)
6	如何构造有为政府的社会基础	(176)
	一、引言	(176)
	二、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有为政府的条件依赖	(177)
	三、有为政府的社会基础: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	(183)
	四、有为政府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替代还是共进	(190)
	五、尾论:夯实有为政府的社会基础	(196)

7	追赶型产业如何实行市场开放	(198)
	一、引言	(198)
	二、国际竞争的绝对优势原则	(200)
	三、市场开放中的规模经济原则	(205)
	四、市场开放中的技术差异原则	(209)
	五、市场开放的边际或双头原则	(212)
	六、尾论:细化追赶型产业的市场开放顺序	(220)
8	如何推动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升级	(223)
	一、引言	(224)
	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225)
	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境	(226)
	四、传统产业的优势维护机制	(228)
	五、产业升级的比较优势转换	(230)
	六、产业升级的两种方式比较	(233)
	七、不同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差异	(238)
	八、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关键在技术	(243)
	九、尾论:全面认识新结构经济学	(248)
9	探索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253)
	一、引言:发展经济学走向何方	(253)
	二、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的逻辑	(256)
	三、“比较优势战略”的问题审视	(261)
	四、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271)
	五、尾论:发展经济学的走向	(278)

第3篇 产业之争的思维审视

10	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287)
	一、引言	(287)
	二、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基本理论依据	(288)
	三、理解产业政策的现实可行性:张维迎的认知剖析	(298)
	四、理解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的批判逻辑审视	(308)
	五、尾论:囿于奥地利学派分析产业政策的局限	(316)
11	现代社会为何需要有为政府	(322)
	一、引言	(323)
	二、为何需要有为政府:基本理论依据	(324)
	三、有为政府的概念是否自洽:田国强的逻辑审视	(337)
	四、有为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田国强的论断剖析	(348)
	五、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化现实市场机制的探究	(365)
	六、尾论:有为政府说为何遭到普遍反对	(380)
12	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逻辑吊诡	(386)
	一、引言	(386)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紧张概述	(388)
	三、实用主义、唯理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传承	(390)
	四、从唯理主义思维到市场至上主义政策的转变	(397)
	五、尾论:现代主流经济学何以偏向市场	(410)

绪 论

本书主要阐述笔者在长期的文献梳理和理论思索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经济增长的观点和理论,它可以追溯到2015年春,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提出中国可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这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到了2015年10月,中央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解决日益凸显的产能过剩和经济低迷问题,这实质上是“中等收入陷阱”说的继续和政策实践。当然,长期以来,笔者沉寂于经典文献的爬梳和系统理论的提炼,默默地归纳、整理和撰写此过程中的所学、所思和所悟,致力于提升自身认知的“为己之学”,只希求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文字;相应地,也就甚少参与时下的学术会议和讨论,更不关注媒体炒作的、不断变动的应用政策和热点论争。不过,在课堂上也曾有学生询问“中等收入陷阱”等热点议题,为了给予学生更好的解答,笔者随后就对长期以来的思考作了梳理并撰写了系列文章以飨学生。到了2016年下半年,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旁观了林毅夫与张维迎、田国强等人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话题与笔者长期探究的市场和政府这两大机制的内在缺陷有关,从而又勾起了在一些共鸣;于是,就决定针对论战者的主要观点撰写几篇评述文章,进而在个人原有的理论和现实认知的基础上又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做了解析和拓展。这样,由长期的文献梳理和理论思考,进而衍生到近期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学术之争的评述,这些文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笔者对经济增长理论和产业政策的系统认知。

纵观本书,很大篇幅都是围绕着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相关论点而展开,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是当前学术界以及实务界非常关注的大事件。不过,本书并不是对新结构经济学及其相关学说的简单评述,而是深深地嵌入在笔者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改革的认知系统中,从而采取了“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的治学方式。事实上,任何一个新的学说体系,要取得认同和传播,都不能仅仅依靠一部孤立的著作或几篇有影

响的论文,而必须拓展到包括方法论在内的整个哲学思维的考虑,并将此方法论运用到不同领域和议题的深入探究进而形成整体性的学说框架,否则往往只会是昙花一现。譬如,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就远远不是凭借开创者门格尔的一部或两部著作,而更依赖于后人的不断拓展和宣传,第二代的维塞尔、庞巴维克以及第三代的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乃至第四代的罗斯巴德、柯兹纳、拉赫曼等学者都在不同领域和议题运用和发展了门格尔的思维和思想,最终构造出影响深远的整体性学说,从而才得以形成独树一帜的流派。基于同样的认知,本书也至少试图在逻辑和学理上优化林毅夫的学说体系,在研究领域上拓展新结构经济学以及有为政府说的分析范围,如提出了公共企业家精神、市场边际开放原则以及小步跑和大跨步式产业升级的最优结合点,等等。

当然,对经济增长以及相应产业政策的扩展研究远远不能局限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因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涉及众多因素,任何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单凭某一单一手段。实际上,在笔者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中,与产业政策有关的思考至少涉及市场如何运行、国家如何运行、法律如何运作、企业如何运作、人类如何行为、文化有何特征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思维特质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诸方面,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撰写了系统性书稿。究其原因,笔者致力于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探索,因而对任何事物的分析都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要上升到系统认知和理论的高度,进而试图挖掘整个运作机理以及背后的认知哲学;相应地,在经济增长和产业政策方面,本书的研究也不会仅仅停留在“标”的层次上,而是致力于探究“本”,致力于理论层面的阐述和提炼,进而强化学说的学理性和思辨性。笔者希望,本书的研究将有助于为读者提供清晰而系统的思维,进而启迪和提升读者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和思考。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介绍

本书的第一部分基于对历史经验的考察和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来探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进而为时下的供给侧改革和产业政策找到理论依据和政策思维;第二部分则以更大篇幅来解读和拓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相关学说,进而对新结构经济学作进一步的学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代发展路向;第三部分则从思辨逻辑上对有关林毅夫

的新结构经济学引起的争论作一评述,进而挖掘不同主张背后的哲学思维,从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缺陷。正是由于本书的很大篇幅都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关,因而,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探讨议题、思想认识和理论发展,就有必要在绪论中对本书论述中所涉及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学说作一简要介绍。

首先,新结构经济学何以谓“新”?

新结构经济学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因而,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就需要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中去寻找。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大体经历了这样三阶段的演变: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需要而兴起了发展经济学,罗森斯坦-罗丹、缪尔达尔、赫希曼、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以及刘易斯等开创者都强调,由于各种市场失灵的存在,欠发达国家往往不能自然而然进入经济起飞,从而需要政府制定特定的产业政策来促进工业化,如通过市场保护来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其次,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激进产业政策相继遭遇了挫败,尤其是拉美国家政府为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扭曲了经济发展,安妮·克鲁格、拉尔等人就发起了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挑战,他们否定产业政策或者其他任何政府干预政策的有用性和必要性,而强调创建自由市场和“守夜人”性质政府的必要性;最后,随着20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在全球各国推行所引发的困境以及21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学者开始再次反思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和论断,再次重视产业政策并积极探寻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变革。正是在此背景下,林毅夫倡导一种基于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相结合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就具有这样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剖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以及市场特性上的差异,试图通过政府的作用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治理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同等水平;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将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视为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事实上,传统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就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或者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构建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依靠保护政策以及实行进口替代等发展起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或者采用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但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在经济一体化的

世界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应该根基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解决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产权保护、信息供给、外部性协调等问题,并同时承认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

其次,发展中国家如何确定目标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以企业自生能力(即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获取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其前提是企业在所在行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微观分析基础而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活动特性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相应地,林毅夫倡导因势利导地促进比较优势转换和生产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其中的关键在于确定发展的目标产业;进而,为了指导各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林毅夫还构建了一套两轨六步法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其中的两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其中,第一步又是关键。为此,林毅夫提出了“增长甄别”的六个步骤。(1)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确定一份满足如下条件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2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2)在该清单的产业中,政府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并设法确定: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障碍;以及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3)对清单上那些全新的产业或是很少从事出口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特定措施,鼓励第一步所确定的高收入国家企业来本国投资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通过设立孵化计划等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4)除在第一步中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并做出必要改进以吸引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私人企业或者外国企业。(6)政府也可以为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中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

再次,有为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如何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应该在产业升级中扮演积极角色,由此倡导了一种积极性的有为政府说;进而,林毅夫还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而将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从而进一步细化了在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和升级中有为政府因势利导的功能承担。(1) 追赶型产业,是指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低的现有产业,如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等。政府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本国企业并购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以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可以支持本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以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而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2) 领先型产业,是指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产业,如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政府可以设立科研基金来支持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大投入、高风险的基础科研,可以通过采购帮助取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在人才培养、资金、法律、领事保护、投资保护上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从而维持该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3) 退出型产业,是指丧失了比较优势或者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富余的产业,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等。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人才培养、展销平台等鼓励产业集群中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在品牌、研发、管理、市场渠道管理等方面升级到高附加值链上,可以通过提供信息、人才培养、资金支持以及合作创办园区等方式协助多数企业转移到低工资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支持产能富余产业中一些企业以直接投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国家。(4) “弯道超车型”产业,是指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如信息、通信产业的软件、手机等。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人才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以鼓励创新性人才创业,并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数量众多的科技人才以及完备的生产加工能力而能迅速将概念变成产品等优势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5) 战略型产业,是指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并且我国尚不具比较优势但关系国防安全的产业,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等。政府可以通过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以政府采购和推广到其他国家来支持其产品的生产,也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来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最后,如何认识不同产业政策的成败?

林毅夫之所以倡导新结构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 GIFF 框架和有为政府说,根本上源于对世界各国大量实践的观察、总结和提炼。事实上,在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和迅猛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离不开特定的产业政策;即使在号称全面推行自由市场的现代发达国家,各国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也都制定了发展制造业的各种产业政策,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德国的“高技术战略 2020”、日本的“以 3D 造型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制造革命”等。产业政策之所以如此普遍,自然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原因;同时,正是由于每个国家在文化、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国情,从而具体产业政策在目标、内容和措施等方面也有不同的选择,进而也影响或导致了产业政策的成功和失败。譬如,基于对二战后世界各国产业政策中成功和失败案例的观察,罗宾逊认为政治因素对产业政策成败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由此提出了五个主要论点:(1) 理论上充分理由相信产业政策可以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 有大量案例能够证明产业政策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3) 也有大量反例表明产业政策的失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4) 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之间的区别在于政策的政治角力上,产业政策的成功往往在于当政者希望工业化能顺利完成,或者是政治体制的激励迫使他们这样行动;(5) 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必须改变他们对产业政策的思考方式。^① 当然,各种因素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往往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一般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赤裸裸的支配和影响典型地出现在二战后,这是由当时国际政治对立的社会形势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壮大经济力量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出现在迄今还未走出未开化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因为政治权力是此类社会中资源配置的主要乃至根本性机制。但是,当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常态”,尤其是对已经融入现代文明并将经济增长和国民生活提高作为基本国策的那些国家而言,影响产业政策的根本因素,与其说还是停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不如说更主要是基于对经济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林毅夫强调思想理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

^① 詹姆斯·罗宾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比较》2016 年第 1 辑。

败上的决定作用,深入剖析了各国制定产业政策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意识,指出了那些失败的产业政策所存在的方向性错误,进而发展了根基于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二、新结构经济学引发争论的缘由

自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以及 GIFF 框架和有为政府说以来,中国媒体界和经济学界就围绕政府功能和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参与这场产业之争的主要学者有张维迎、田国强、文贯中、黄益平、韦森、许小年、李稻葵、吴敬琏、毛寿龙、冯兴元等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争论?这就涉及不同学者在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上所持立场和观点的差异。那么,不同经济学人的立场和观点为何存在如此不同呢?很大程度上,这就涉及不同学者所接受的学说和思维上的差异。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观,无论一个人的理性如何坚实、缜密,他们的阶级背景或其他社会因素将决定他们思考的方式和结果。但实际上,真正的学者很少会囿于个人利益,却往往会为其所接受的特定理论或信念所遮蔽。从学术史就可以发现,学者们很少会有意识地为其阶级、集团利益辩护,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甚至与其所隶属的阶层往往相差很大。例如,在启蒙运动时期,很多思想家都具有社会特权背景(是贵族或高等法官的子弟),但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跳出当时教会或贵族精英的圈子,积极推动社会的改革而不是维护社会等级和现状;而且,为了坚持和推广自己对人类社会所持的理念,他们的活动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小到被罚款、丧失经济保障,大到被流放、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死刑,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典型。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和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很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学者却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热衷于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市场经济辩护,如弗里德曼、罗斯巴德就是典型。更为直观的对比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李嘉图致富后买了大量的土地而成为一个大乡绅地主,马尔萨斯却一直是一个清教徒和教师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但是,李嘉图却极力主张废除当时有利于传统地主阶级的谷物法而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而马尔萨斯却极力维护谷物法且最多是一个冷淡的自由贸易者。

也就是说,真正学者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出身

背景和个人利益,不如说与他的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韦伯就指出:“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①凯恩斯则进一步强调:“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扩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②更进一步地,哈耶克高度评价了凯恩斯这段话,并指出:“如果一个自由社会要得到继续或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必须传播的就是信念,而不是那种在眼下看似可行的东西。”^③事实上,面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哈耶克就认为,这主要是西方社会日益为建构理性渗透的文化所赋予的第二禀性所决定的。哈耶克写道:“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我们在智力阶梯上攀登得越高,我们越是与知识分子谈话,我们就越有可能遇到社会主义信念。理想主义者大多数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④但显然,当前经济学界所面临的情形恰恰相反,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后的日益隆盛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部分经济学人开始信奉自由市场,开始迷信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而也就热衷于为现实市场的一切现象以及市场下的收入分配辩护。

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地位、家庭出身和既得利益等对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立场没有影响,相反,正如马克思等看到的,这种影响往往还非常显著。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要借助于一系列的社会机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既然一个学者的学术主张和立场主要取决于他所接受的理论和知识,那么,他的理论和知识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一般地,这无非有三大基本途径:一是在家庭中的感同身受,二是社会上的耳濡目染,三是学校中的教育学习。具体说明如下:(1)家庭中,统治阶级的父母往往为现有的文化伦理、社会秩序、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分配体制

① 韦伯:《儒教和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7页。

③ 哈耶克:《“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9页。

④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以及政府政策进行阐述和辩护,子女的思想洞识和学术立场自然地也会受到影响;(2)在社会上,统治阶级父母的朋友圈和社会交往往往是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显贵达人,他们的主张和行为方式也会影响到子女今后的学术倾向;(3)在学校中,统治阶级父母往往会送子女去那些相似阶层孩子的学校接受正统思想的教育,漫长的学校生涯也会形塑此后一生的思考方式。尤其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控制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往往会通过控制媒体、学术机构等精神生产资料而宣传和塑造反映其意志的社会思想,甚至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社会思想也就成为所有成员都认可和接受的传统智慧,上层阶级更倾向于维护这种传统智慧。

不过,真正的学者也会跳出这种传统智慧的束缚。其动力主要在于:(1)具有强烈的学术理念和批判精神,这会促使那些真正的学者致力于剖析隐藏在流行观点和政策背后的缺陷;(2)盛行强大的社会革新和反思思潮,这使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社会变革时期往往会出现能够与社会传统、家庭身份决裂的真正学者。尽管如此,真正的学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学者都是在遵从前人的足迹或者既定的范式,从而往往会深陷于传统智慧之中;尤其是,在学术大众化时代以及市场堕落效应显著时期,无论哪个阶级或家庭出身的学者往往都倾向于接受和传播传统智慧,都热衷于迎合流行的学说和信条。譬如,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只有接受现代主流经济学训练并撰写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文章才可以在“一流”专业刊物上发表,才能获得学术岗位和晋升机会,因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必然倾向于传播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正是基于学术和理念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学人为何如此相信市场和推崇企业家。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其说是出自个人利益不如说是囿于学术信条。究其原因,在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材中,经济分析框架和相应理论都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传统,进而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生物学信条运用到人类社会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观,进而发展出了所谓“存在即合理”的伦理自然主义。

更为甚者,一些经济学人为了寻求支持,还想当然地将这种思潮与存在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这是对存在主义的严重误解。究其原因,存在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区分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其中,自在存在仅仅是自然存在的,并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是,它并不是人类的有意